

五十年前爆發的文化大革命，對當代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深廣悠遠，可相關研究仍顯單薄。據說，《二十一世紀》是中文學界少數推出專輯的刊物，這到底是幸抑不幸？本期「三邊互動」的幾篇回應，希望有助拓深文革研究的討論。

——編者

「惡之花」的擴散機制

嚴飛〈政治運動中的集體暴力：「非正常死亡」再回顧（1966-1976）〉（《二十一世紀》2016年6月號）一文，利用全國縣志數據庫和非公開出版的廣西省內部檔案資料，結合宏觀和微觀層面，對文革集體暴力所導致的規模、對象和內涵進行重新檢視，指出「非正常死亡」是國家權力機器和群眾造反派製造的全國性的普遍現象。應該說，這一論斷令人信服。

該文最大的亮點是從制度結構層面對集體暴力動因所做的深刻揭示：文革時期的極端暴力之所以大規模擴散，根源於極權主義政治制度所建構的一套政治身份框架，將人們控制在不同的政治地位中，並給予差異性的政治待遇。極權主義發明的這套政治身份體系的高明之處（也是其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一旦啟動，便可自我實施。因為該體系沒有一個明晰確定的判定標準，所以每個人的內心終日恐懼：今天是「人民」一員，一旦表現不好，明天就有可能成為被鎮壓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的「敵人」。於是，每個人不但要努力表現得「革命」（暴力），而且必須要「更革命」（更暴力），唯恐落後。所以，一旦啟動了「只有更暴力才能避免被暴力所傷」的體系後，任何人都無法讓它停止。

嚴飛這篇文章啟發我們必須從結構和發生機制上深層次反思文革，才能避免悲劇再次發生。為此，我們更需要進一步思考：集體暴力的擴散機制及其所製造的普遍性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僅僅存在於文革時期嗎？或者說，文革時期的這種集體暴力是一種歷史演進的必然，那麼其根源在哪裏？是甚麼讓「惡之花」開得如此嬌豔且經久不衰？

劉培偉 泰安

2016.6.19

被運動的群眾組織

1967年8月4日，轟動全國的「八四武鬥」事件起源於上海柴油機廠群眾組織「聯司」與「東方紅」的對立。這兩派組織如何產生，又因何對立？

王芳在〈官僚派系政治與群眾組織的產生——以上海柴油機廠為例（1966-1967）〉

（《二十一世紀》2016年6月號）一文詳細分析了最初參與上柴廠文革進程的兩派幹部。一派是主張造前廠長反的軍隊轉業幹部，他們掌握着廠黨委的領導權，以文革鬥爭邏輯而言，應屬被批鬥的「當權派」。待到「東方紅」成立後，這批「響噹噹的造反派」又成為該組織的領導中堅。與之相對應，上柴廠還存在着主張「保」前廠長的幹部。這些保守派幹部獲得了該廠上級主管，尤其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馬天水的支持。他們也建立了群眾組織「聯司」。文章認為，這兩派幹部的較量是形成不同群眾組織的直接原因，換言之，群眾組織從成立之初就帶有派系色彩。

作者這一看法無疑是有見地的，不過其歷史敘事部分或有進一步的拓展空間。譬如馬天水此時為何反對造反派？文章提到二者之間有個人積怨。除此原因外，不妨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來展開討論。文革伊始，大多數高幹雖然口頭上擁護「造反有理」，內心卻對衝擊既有秩序的激烈行為極為反感，更不認為造自己的反有何理可言，因此他們很自然地傾向保守派，或者乾脆在幕後策劃成立以「群眾組織」面貌出現

的團體，操縱他們去對抗造反派組織。這便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由來，馬天水也曾是這條「路線」的一份子。

從王芳文章還可看出，上柴廠的文革進程與各種幕後力量意圖實現自己的個人目的密切相連，至於「反黨」、「揪特務」、「反修防修」只是他們內爭的精美包裝。如果說參與上柴廠文革活動的幹部是以激昂的辭藻塗飾其利益之爭，那麼上層的「革命行動」呢？這是從該文引申出的另一個饒有意味的問題。

黃駿 南京
2016.6.21

因政治原則轉換被清洗

經過延安審幹和整風運動，中共建立了系統而龐大的人事檔案制度。新中國成立後該制度適用範圍從幹部擴展到全國所有居民，每個人的檔案都記錄其履歷、社會關係、政治和業務表現、組織評價。對於個人的社會活動，檔案審查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驟。這套人事檔案制度實際上弊病叢生，但文革之前從未導致尖銳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

1966年夏秋之間，革命造反派崛起，黨組織或工作組此前建立的運動檔案，變成了造反派眼中的「黑材料」，追查「黑材料」風潮開始蔓延各大城市。樊建政、董國強的〈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黑材料」風潮〉（《二十一世紀》2016年6月號）一文追溯了復旦大學文革初期運動的動態發展，概要介紹了「黑材料」問題怎樣成為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間衝突的矛盾，再發展為難以調和的激烈對抗。

在作者看來，文革初期校方領導運動時建立的運動檔案以反右運動為模板，而運動發展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政治原則卻轉到相反方向。對學生造反派來說，他們無法容忍校方此前對其造反動因的負面評價；對黨組織來說，以前的職業行為現在卻成為重要的政治風險。因此，在文革的政治原則轉換階段，圍繞「黑材料」問題，校黨委與造反派學生的衝突變得尖銳起來，這實質上是不同群體對彼此「社會身份」重設權的爭奪。

文章末尾提出的解釋精煉有力，作者或可通過更為細密的案例研究來加以擴展或修正。「黑材料」問題是文革時期檔案制度面臨衝擊的一個典型事件，如果放到整個文革時期檔案制度變化的視野下觀察，還有很多重要的議題值得研究。比如，1967年夏季造反高潮中搶檔案活動曾普遍流行，但隨着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這些搶檔案活動普遍被批判為「極左」行為，到了1970至1971年清查「五一六」反革命份子運動中，這些搶檔案活動又作為大案要案被進一步清算。

范世濤 北京
2016.6.20

「走失」在公社化道路上的「巴黎公社原則」

李遜的〈巴黎公社原則在文革中的蛻變〉（《二十一世紀》2016年6月號）一文認為，文化大革命期間之所以出現「人民公社熱」，是當時中共一些領導人對巴黎公社美好願景不斷追求的產物，在本質上是

「底層民眾企圖借毛澤東的烏托邦參與權力的自下而上的『共權風』」。文革期間的人民公社運動最初以巴黎公社原則為準繩，試圖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建立起新時代的「巴黎公社」，但是當以上海人民公社為代表的公社運動危及到政權的現實利益和社會穩定時，中共一些領導人的思想迅速發生轉變，最終使文革中的人民公社運動偏離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則。

這篇論文是李遜所著《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一書部分內容的擴展。作者以時間為序，以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有關人民公社運動的思想變遷為主線，考察文革中人民公社運動逐漸偏離巴黎公社原則的嬗變過程。作者抓住毛澤東思想中的公社運動情結，注意到1958年農村人民公社化與文革中城市公社化運動的聯繫，以上海人民公社為研究對象，從「徹底打碎到只能部分改善」、「巴黎公社式的選舉到民主協商」、「公社委員工資收入不得超過工人到新幹部補助」、「工人武裝到民兵指揮部」等方面，論述巴黎公社原則如何在運動中一步步遭受背棄。之所以出現這種背棄，作者認為「直接選舉」和「官員工資不超過普通工人」的巴黎公社原則，「因為觸及自身利益或執政正當性」，必然不能實行；而「徹底打碎國家機器」和「取消常備軍」兩個原則是「因為與現代社會和國家管理相悖」，所以無法實行。

梁立佳 福州
2016.6.22